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6011

# 邱华栋“北京时间”系列小说中 外来女性形象及其历史意涵

朱瑜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20世纪90年代, 外来女性进京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邱华栋的“北京时间”系列小说以此为素材, 塑造出了一批令读者印象深刻的外来进京女性形象, 其大致可分为外来知识女性与乡村进京女性两类。在其小说中, 北京的城市生活改变了这些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感状态, 赋予她们新的生活方向, 她们也在与自我的不断搏斗中完成了自我道路的选择。外来知识女性更多将目光投向家庭内部, 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权制的回归, 其反而带来了女性家内地位的提, 促成了家内性别秩序的转化, 她们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导权也促使她们主动寻求新的理想生活。乡村进京女性则横跨于新生活与传统道德之间, 这种状况造成她们个人身份认同危机; 她们主动放弃了北京带给她们的物欲生活, 重新拾起自我认同的“道德”。

**关键词:** 邱华栋; “北京时间”系列小说; 外来女性; 性别秩序; 理想生活;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5)06-0099-09

## Migrant Women Figures and Their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in Qiu Huadong's “Beijing Time” Series of Novels

ZHU Y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90s, the influx of migrant women into Beijing became a common phenomenon. Qiu Huadong's “Beijing Time” series of novels used this as material to create a group of impressive images of migrant women entering Beijing, whi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educated migrant women and rural women entering Beijing. In his novels, the urban life in Beijing changed the daily lives and emotional states of these women, giving them new directions in life. They also completed their own path choices in the constant struggle with themselves. Educated migrant women tend to focus more on the family,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e return of patriarchy. On the contrary, it brings about an improvement in women's status within the family,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nder order within the family, and their dominance in gender relations also encourages them to actively seek new ideal lives. Rural women entering Beijing are caught between the new life and traditional morality, which creates a crisis in their personal identity. They voluntarily chose to give up the

收稿日期: 2025-06-26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世界华人作家的北京记忆书写与京味文化建构”(24JCB010)

作者简介: 朱瑜, 女, 山东济南人,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思想文化。

materialistic life that Beijing brought them and pick up the “morality” of self-identity again.

**Keywords:** Qiu Huadong; “Beijing Time” series of novels; migrant women; gender order; ideal life; identity recognition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进城”潮席卷整个社会。“北京”因其“首都”的城市定位、老北京的文化辉煌以及中心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成为一代人的“梦想之城”。因而,“京漂小说”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出现在大众视域中,邱华栋的创作则被公认为是该类小说中的经典。

“北漂文学”仿佛天生带有一种刻板意义上的“男性气质”,女性形象在其中被提及,似乎也只是男性形象的补充,然而,在邱华栋“北京时间”系列小说中,“女性”却占据了重要位置,折射出时代的印记和别有意味的含义。同时期的卫慧、棉棉等,则试图勾勒上海女性对情爱自主以及物欲的渴望;在她们的笔下,这些女性追求生命本能的释放和物质生活的快乐,将整个城市视为“消费”的符码。尽管邱华栋也注重描写北京现代繁华的一面,但不同于上海女性书写的极端享乐主义,其小说中更多是对时代剧变以及传统道德的反思。邱华栋小说中“外来女性”面向驳杂,她们既面临着外来城市女性普遍存在的物质追求与道德困境的双重挑战,在物质诱惑与道德准则的矛盾中挣扎;又承受着乡村女性在时代夹缝中所遭遇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在传统观念与现代发展的冲突中徘徊。其整体性地表现了20世纪90年代北京“外来女性”的历史图景。在这个意义上,同样是书写女性在时代大潮中的悲欢,邱华栋的写作不仅与同时代女作家们的写作构成了对话和补充,其小说独具的现实感,更使后来者足以从中窥探一定程度的历史真实。同时,邱华栋笔下的女性人物现代与保守兼具,表现出时代转折中女性面对传统儒家道德与新兴城市金钱观念的矛盾心态,这一被凸显的女性特质,亦内化为“北京”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城市气质。

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的关注点集中于邱华栋小说的“北京书写”方面,而忽视了其女性书写对深入理解20世纪90年代的意义。论者几乎都意识到了邱华栋敢于挑战城市书写的雄心及“20世纪90年代”之于邱华栋城市书写的本质意义<sup>[1-5]</sup>。

在此前提下,有论者进一步指出了邱华栋北京书写的历史感与文化特质<sup>[6-9]</sup>,对其广阔的历史视野以及问题意识所造就的跨区域流动书写<sup>[10-11]</sup>更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然而,不论是关注邱华栋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书写,还是对其跨区域流动的探索,女性群体作为作品的主体之一,却并未得到这些论者的充分重视。吊诡的是,在为数不多的关注邱华栋女性书写的评论中,却出现了截然对立的观点。比如,荒林认为邱华栋小说中充满了对女性独立之美的欣赏<sup>[12]</sup>,而另有论者则指出在邱华栋小说中女性只是城市欲望的一个喻体<sup>[13]</sup>。笔者认为,仅仅赞扬邱华栋对女性的敬畏,或一味追究邱华栋是否与莫言、贾平凹秉持同一种女性意识,对于进一步推动邱华栋的研究意义有限。本文试图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视野中,去解读邱华栋作品中这些女性形象本身及其人生经历所反映出的时代意识,因为这对理解中国社会发展以及女性解放历程至关重要。

本文主要以邱华栋“北京时间”系列小说中的外来进京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这些女性形象,生成于20世纪90年代,同时也存在于自晚清以来的女性解放运动的延长线上。倘若以内在的历史感审视这些女性形象的生命状态以及现实困境,则可以借此把握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状态以及在此状态下女性道路选择的可能性,同时探求“北京”的城市特质如何改变她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和生命轨迹,以及这些女性如何反向为“北京”赋予新的城市质感。

## 一、历史处境与女性进入“北京”的契机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进京赶考”作为自我实现的途径,是专属于男性知识分子的特权。不少文学作品以此为情节,上演了一出出“桥段”。女性的缺席,一方面是因为中华文明本质上为农耕文明,与土地联系紧密,漫游意味着家园的丧失以及与主流秩序的脱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传统社会中对性别秩序的规定。19世纪末期,中国

社会的组织形式发生变化，科举制度瓦解，女学兴起，女性越来越多地从家庭中出走，进入到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中实现自我。此外，城市的发展也为女性提供了走出家门、寻求自我的空间。北京作为彼时的文化、教育中心，风气更为开明，成为女性外出的首选之地。自此，“进京”不再是独属于男性的权利。从1919年邓春兰去信给蔡元培，促成男女合校，到冯沅君等第一批五四女作家进京求学，再到丁玲侨寓于“通丰公寓”，寻求人生出路，女性进京求学成为现代城市史与文学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也成了透视中国社会发展和女性问题的“一面镜子”。如上所述，尽管晚清以来就有女性进入北京的先例，但囿于女性的历史处境和女性解放的历史进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只是个别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镇化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加之我国“男女平等”政策的实施，女性外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北京以其古老的记忆和日益繁华的城市景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其中求学、务工，正如魏微的小说中所描述的，“我们必须择城而居，过最明亮的生活。我们的理想国是北京、上海和南京”<sup>[14]</sup>。

邱华栋的“北京时间”系列小说，不同于《新美人》中以标签化的女性形象作为表现重点，他并未将外省进京女性设置成小说的中心人物，但这些女性在被作者无意识“凝视”的过程中，却显示出更真实的生存与生命状态。有学者评价邱华栋的写作为“一种直觉式的观察思考，而不是社会科学的理性分析”<sup>[15]</sup>。这种外在于学院的思考，恰恰在20世纪90年代学科化、知识化、专业化、规范化的背景下，有更真实的表现力和更强的批判力。

邱华栋对进京女性的历史处境的观察极为敏锐，他类型化地塑造了一批进京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总体来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白昼的喘息》中，“我”的女朋友阎彤，纠缠于进与退之间，她被“我”描述为患了病的“疯女人”；而“我”愈在北京，阎彤的“精神病”就愈严重。她不断地进京看望男朋友，并督促男朋友随自己回家乡结婚。秦颂的女朋友安沫，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因男朋友秦颂在北京，她毕业后随即也来到北京。她痴迷

于在北京的地标性建筑旁表演行为艺术，多次被警察带走，最后与秦颂的婚姻也黯然收场。谢悦曾就读于某戏剧学院，大学毕业后工作过两年。在丈夫生意发达后，她选择在家当一名“有钱有闲”的全职主妇，后因要求与丈夫离婚而被杀害。《花儿与黎明》中，周瑾是北京某高校一名英语老师。硕士毕业后，她从武汉来北京工作，和本科毕业便来北京工作的马达结婚。她婚后对生活状态不满，又先后和王强、外商穆里施产生情感纠葛，最后和穆里施结婚、出国。《正午的供词》中，出生于安徽的夏百灵，在北京呆了多年，与导演潘岳互相成就，成为有名气的国际影星；后来在与潘岳的婚姻纠葛中被其杀害。第二类是底层女性。《白昼的喘息》中，“我”在亮马河旁边偶遇的女人叫杨梅。她来自黑龙江，弟弟去世，靠母亲摆摊维持生活，患病的父亲换肾需要几十万元。于是，她在小城里当上了“小姐”。3个月后，她给家里留了一笔钱，随后南下北京。《教授的黄昏》中的乌梅，来自外地农村，家境困难，师范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加之要还助学贷款，只得选择给赵亮夫妇代孕。后来，她对代孕的胎儿产生了感情，最后带着胎儿一起消失了。赵亮的情人韩樱子，家在安徽农村，父亲早逝，她高中毕业后考上省内的农业大学，母亲却决定只让弟弟上大学。为了生计，她来北京的小型服装企业打工，成为一名“打工妹”；后又到韩国人开的歌厅当前台接待。随着家里开支越来越大，她不得已做了赵亮的“情人”。后来因为与赵亮的争吵让她觉得自尊受创，于是她再次回到娱乐城当领班。韩樱子的朋友云彩姑娘，一直想离开这一行业，结果得了抑郁症。在她父母离世后，她没有了生活负担，就在服装市场开了一家卖装饰品的小商店。总体来看，底层女性进京首先面对的是“谋生”的困难，而知识女性面临的多是如何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生活以及精神上的满足的问题。她们因为求学、工作、婚姻、谋生等原因，带着对生活的期许，从“地方”来到北京。她们以“异乡人”的身份，面对、拥抱、质疑着北京，既面对着“京漂”共同的难题，又有属于女性群体本身的困境。

邱华栋的小说被认为是“新写实写作”<sup>[16]</sup>，刘震云甚至认为，邱华栋“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他



就能把我们刚刚看见的生活,眼前发生的新事,迅速放到他的小说里”<sup>[17]</sup>。这一描述可谓精准。邱华栋作为20世纪90年代北京社会发展的见证者,他的小说的确是以20世纪90年代北京社会生活为底色的。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生长期,面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挑战,新的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出现了,其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思想状态。其中,女性的受教育群体进一步扩大,农村妇女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规模也与日俱增。换言之,她们的生命状态内在于历史进程,与时代的发展休戚相关。进京女性往往站在“中心—地方”“城市—乡村”的中间位置,来面对时代和自身所出现的新难题。邱华栋小说中的进京女性,也多是在这一历史维度上勾勒出来的。譬如,1989年大学开始收费后,韩樱子的家庭要供养两个大学生时出现了经济困难,而母亲的性别观念则决定了她要辍学打工,以保障母亲的生活与弟弟读大学。1999年后,大学扩招,大学生失业情况加剧,乌梅就是其中的一例。《白昼的喘息》中,秦颂等人对安沫贤妻良母角色的期待,可以看作是对《伤逝》中子君饲养油鸡一幕的历史性回应,也与社会上出现的新一轮“贤妻良母”现象以及回归家庭的讨论相关<sup>[18]</sup>。周瑾父母对出国的狂热态度以及周瑾最后的情感选择,是世纪之交出国热潮席卷中国的缩影。

## 二、性别秩序的转化与外来知识女性的理想生活

新时期以来,《寻找男子汉》《方舟》等作品中对理想男性的追寻,以及对所谓“阳刚之气”和男子气概的呼唤,标志着传统性别观念有所回潮。据宋少鹏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妇女界和思想界分别发起了两场“妇女回家”的论争<sup>[19]</sup>。这是否意味着传统性别秩序重新在社会层面上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鲁迅为娜拉开出的药方是“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即首先要有经济层面的独立,真正的女性解放才有可能实现。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都市女性在实现经济层面的独立后,是否意味着她们就有能力实现精神上的独立,锻造出自我主体性,彻底地克服困境,理解自我并掌握自己的幸福呢?

邱华栋小说中的女性,在行为方式上较为一致地显现出某种对男性的“追随”倾向。当中学老师的阎彤、毕业于艺术学院的安沫、曾经工作过几年的谢悦、在高校工作的周樱、从事影视工作的夏百灵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女性,都在普遍意义上具备了经济独立的能力,城市也为女性多元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更为包容的环境。譬如,沉迷于个人装置艺术的安沫,她本人的行为表现出一种“非主流”的状态,更因为其影响了公共秩序而引来警察的注意。但当她向警察解释清楚自己的行为后,警察不仅没有扣留她,还原封不动地将装备还给了她。这表明,主流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对异质性生活方式是宽容与接纳的。但是,经济的独立能力和开放包容的社会生活环境并没有使她们明晰地生发出以自身为主体制定自我发展目标的动力。阎彤任教于家乡某中学,收入几乎全部用来接济北漂的男友,而这种“圣母”式的牺牲行为,则在于与男友结婚是她的首要人生愿望。纵然是国际影星夏百灵,也在婚后将追寻家庭的稳定作为人生的中心。夏百灵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并不逊色于潘岳。两人婚后,夏百灵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丧失了追求事业的动力,同时她对潘岳抱有同样的期待。这一分歧导致了两人的情感嫌隙。此外,还有安沫和周樱。她们一毕业就到北京投靠男友,谢悦则变成了全职太太。如上所述,传统的“男性中心”“小家庭中心”观念影响着女性的社会生活及个人道路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强调两性差异的“性别本质论”逐渐深入人心。这一话语在与市场话语结合后,逐渐转化成一种对“女性角色”的想象范式。譬如小说中对夏百灵生活方向的描述:“夏百灵竟然萌生了息影或者暂停演艺生涯的念头,转而和潘岳生孩子,进入一种纯粹家庭生活的状态。”<sup>[20][21]</sup>秦颂的期待代表了社会对女性“贤妻良母”角色的期待:“秦颂还欣喜地以为安沫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贤惠的家庭主妇,打算养上足足一百只鸡什么的,来跟着他过日子,叫他天天可以吃上鸡蛋。”<sup>[21]</sup>这样的情节设定源自一种性别化的行为规范和期望模式,那就是人们期望女性能够为男性提供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价值,比如照料等。从彼时整体的公共空间来看,相较于男性,女性大多承担着内容琐碎、地位较低、符

合“女性”角色期待的工作。“男人继续统治公共空间和权力场（特别是生产方面的经济场），而女人注定（主要）致力于象征财产的经济逻辑永久存在的私人空间（家庭、生殖场所），或这个空间的延伸形式即社会服务机构（尤其是医疗机构）和教育机构，或象征生产的空间（文学场、艺术场或新闻场等）。”<sup>[22]</sup>

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化改革使得女性成了企业中的“劣等”劳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40年政府动用行政的力量将传统女性职能社会化，女性得以在公共空间内平等竞争。市场经济以来，澡堂、食堂等保障家庭运转的公共职场退出了日常生活，但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并未彻底消除，加之生育等自然原因，女性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自然变弱了。女性经济回报减少之后，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女性退回到日常生活场域就变成家庭利益最大化的最优解。

私人领域逐渐替代公共领域成为女性新的生活方向，经营好自己的“日子”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幸福标准。夏百灵在与潘岳结婚后，她的注意力转移到“水龙头、门把手、开关门板、床头灯、三通、塑料垫圈儿、洗衣机专用水龙头、微波炉餐具、起子、桐油”上，关心的是“比较一下地板和主要家装材料的价格。咱们别让装修队蒙了”<sup>[20][225]</sup>。潘岳对家庭琐事的态度则是“房子的事我不管，最好叫我少管一些”<sup>[20][226]</sup>，甚至以章太炎、王国维的轶事引以为证。与这种社会风尚相呼应的是女性在家内地位的提升。

相较于传统的“性别政治”<sup>[23]</sup>，20世纪90年代家庭内部表现出对传统性别秩序的颠覆。女性在家庭内部事务中占据着实质“主导权”，同时女性在婚姻关系中也决定着两性关系的走向。男女两性所展开的家内性别关系、性别角色调整策略，不仅是对父权制模式的调适、打破，也是一种基于现实境况的男性权力让渡。阎彤是邱华栋笔下具有传统女性“美德”的人物，从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看，她更类似于同时期成书的《白鹿原》《废都》中的“仙草”“牛月清”等贤妻形象。她在经济上给予“我”支持，却被“我”描述为“疯女人”。“疯女人”的历史由来已久，譬如《阁楼上的疯女人》《藻海无边》。倘若女性妨碍了男性的自由，男性便会把女性塑造为“疯女人”，

“疯女人”成为男性“摆脱”女性的一个借口。阎彤多次来到北京，却无法适应北京的生活。尽管“我”对阎彤有不满，结果却是“我”放弃了北京的游荡生活，随阎彤回到家乡生活，两人的生活方向显然是由阎彤把握的。周瑾在同学聚会时，看到当年在学业上不及自己的同学在物质生活方面已然优于自己后，产生了一种不忿的心态。当周瑾遵循一种传统生活秩序、固守传统道德之时，她需要面对的是真我的隐藏和无休止的迷茫。她把这一切归咎于马达无法给她提供理想的生活状态，尽管这种理想生活可能是被“历史现代性”观念塑造出来的。她主动提出与马达结束婚姻关系，却遭到马达的拒绝。她与马达在并未解除婚姻关系时，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对自己与王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犹疑。周瑾始终没有像同时期《上海宝贝》中的上海新女性一样，彻底地享受个人自由。感情的缠斗不止于此。她不断寻求新的机会，希望重新找到工作，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在一家外企应聘的时候，她认识了穆里施。在穆里施表白后，她的观念几乎迅速发生了动摇。她似乎明白了，她对于王强的感情并不是爱情，而只是将其当作一根救命稻草。如此，周瑾在与自我搏斗的路上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蜕变，走上了新的人生征程。她的主动改变很大程度上呼应了社会思潮的召唤。可以说，“北京”改变了周瑾对世界的感觉，使她难以安于自己现在的位置。马达最终亦明白自己不是在与周瑾对抗，自己需要面对的是时代浪潮的转变。在时代的潮流面前，两人的婚姻已经无法维系。马达不得不释然自己的不甘，接受了离婚的现实。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正历经从传统古都到现代性都市的过渡，它现代性的一面可比拟同时期的上海。正如王安忆笔下的“阿三”。阿三20世纪90年代初向往的是“上海”与“外国”的联姻，她的那些外国男友与其说是她未来的丈夫，不如说是她“走向世界”的桥梁<sup>[24]</sup>。

谢悦和夏百灵不甘现状，渴望激情，行动力强，在追求自我生活的同时，她们也更加彻底地摒弃传统伦理道德。谢悦希望通过婚姻中男性的金钱地位，来满足自身的生存以及欲望。消费社会到来，“有钱有闲的富太太”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不劳而获的负面含义，而成为一种让人羡慕的社会身份。



丈夫能为谢悦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但与之相随的是其在日常生活中的缺席,她也因此感到情感上的匮乏。谢悦为“我”身上的文艺气质以及陪伴所带来的情绪价值所吸引,从而在与“我”的交往过程中出轨,最终招致丈夫的杀害。如果说谢悦的婚姻有物质的考量,那么夏百灵与潘岳的结合几乎可以看作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结合。潘、夏二人的合作造就出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而在这一过程中,两人互相欣赏、互生情愫,甚至抛弃原本的爱人,走向了婚姻。在结婚之后,夏百灵作为女性,精力逐渐涣散,家里的大小琐事以及是否生育孩子,无不牵动着她的神经。然而,潘岳对这些事表现得毫不在乎,致使夏百灵对潘岳的爱逐渐丧失,将情感的天平倾向新认识的刘志松。潘岳无法在精神上接受这一事实,最终将夏百灵杀害。

阎彤通过“回乡”过上了理想生活,周樱则将理想生活诉诸走向更远的“现代性”,谢悦、夏百灵在追求新生活的过程中走向了毁灭。显然,在作者的眼中,阎彤、周樱走向了生活的成功,谢悦、夏百灵的“死亡”代表着追求自我生活的“失败”。作者不仅用肉身的消失来惩罚女性超越中国传统伦理观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其似乎竭力要证明,符合传统道德评判的女性欲望能够在本土生根发芽,溢出传统规范的现代女性欲望则可能难以在本土生长,而周樱的“成功”似乎指明了现代女性欲望的出路。周樱既没有堕落,也没有回去,而是将西方现代化家庭视为新的人生目标,意在将婚姻形式从“中国传统家庭”转轨为“跨国家庭”,这无形中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西方物质现代性实践相耦合。对于女性道路的探索而言,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突破,也是另一种生活的开端。至于这种新的出走方式是否意味着幸福的真正降临,是否会产生新问题,则需要进一步探讨。

相比较而言,周樱对自我生活的追求过程更为曲折,其主体意识也在情感自我搏斗中更为明晰。阎彤的主体感觉更多地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中,遥远,不清晰,她凭借着一种传统中国的生活惯性引导自己的生活。因而,阎彤的生活状态更像是作者对于逐渐消逝的中华传统生活状态的怀念。她需要进一步走向开放,才有可能走向

真正的幸福生活。这是由时代变化所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以经济建设作为发展的中心,西方的物质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变成未来生活的写照,正如卫慧的作品中,外国男性通常拥有更多的经济和文化资本,《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也执着于出国。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职业与母性之间的冲突成为女性最大的困厄<sup>[25]</sup>,“妇女能顶半边天”则将这种矛盾巧妙地掩藏起来,使女性担负着事业和家庭的双重责任,深陷新的困境之中。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前40年的绝对男女平等模式遭到否定,却以自然生理差别的名义保留了男女家庭内性别分工,结构性地造成女性在市场经济下的“劣势”。随着商品市场经济的深化,“男强女弱”的传统性别观念、“男主内女主外”的传统性别分工在和市场经济结合后呈现回归的趋势,但其与传统的父权制度下的性别观念有所区别。此时,性别秩序的家内转化也在悄然发生,女性很大程度上成为婚姻关系变动的推动者,不断探索符合自我主体感受的理想生活。

### 三、乡村进京女性的身份认同危机及其解决

出走的“娜拉”能否走向真正的自由独立是百年来被反复讨论的问题。从世俗意义上看,“娜拉”的物质生活没有忧虑,她的出走是为了争取更为理想的生活状态。女性的出走多为激情所致,浪漫主义的行动本身就是不计后果的,但其最终结果往往是前路模糊。尽管如此,“出走”对于女性争取自主权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乡间女性而言,生活原本就是残酷而举步维艰的,出走到城市,是否能够拯救自己的生活更是未知数。

改革开放以来,“流动”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状态,“北京梦”“深圳梦”“上海梦”乃至“中国人在纽约”的成功故事屡见不鲜。但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叙事,还是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现代化的书写,在城市面前,农村女性对其一直是仰望的姿态。她们要么如“香雪”(铁凝《哦,香雪》)被城市所启蒙,要么如“英芝”(方方《奔跑的火光》)被城市所吞噬。对现实状态的不满,促使她们成为自我转变的积极行动者。这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旅程,也被描述为反抗命运的自

觉行动。

邱华栋小说中的乡村女性却有所不同。相较于一些作家笔下的乡村女性离开家乡来到城里打工或求学的行为，被称为个人意识的觉醒，邱华栋笔下的女孩们面临的更多是因经济困窘而不得不进城寻求出路的无奈。杰华在《都市里的农家女》中提到，“改变命运”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女性流动到大城市的主要动机，但这一叙事实际过于强调个体的奋斗信念，掩盖了打工妹更加复杂的现实动机以及所经历的真实生活情况<sup>[26]</sup>。邱华栋意识到了北京的韩樱子们面临着更复杂的经济难题。不同于上海的妙妙、阿三（王安忆《妙妙》《我爱比尔》）那样无父无母的状态，她们与家庭之间的代际关系浓厚，为家庭所牵绊。面对千疮百孔的家庭境况，她们年纪轻轻就被迫成为家庭的经济“主心骨”，背负着家庭的重担。家庭的经济问题是促使她们进城，甚至是致使她们沉沦的主要原因。

市场经济在号召她们奔赴城市的同时，没有向她们承诺相应的位置和身份。她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眼前的经济问题。在时代红利面前，杨梅、乌梅、韩樱子、云彩等实际上两手空空，她们唯一能支配的只有自己的“身体”。因而，在城市谋求到的新挣钱方式，无一不与女性的生理机制相关。出于生存的难题，她们被迫走上悖于她们长久以来的道德认同的道路，这势必造成她们个人身份的撕裂。随着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新生活与旧道德的冲突、非正常的恋爱关系、两性关系中隐含的性别等级等，都使她们陷入身份认同危机。横跨在城市生活与乡土伦理之间，她们的心灵在新的生活环境与自身道德认同之间被撕裂的痛苦，是难为外人深切体察的。最终，她们还是难以突破原生身份的困境而实现阶层跨越。就这样，在对个人生活道路选择的迷茫和个人主体身份的犹疑中，她们重拾“传统伦理”，并以此支配她们的行动，应对生活环境的剧变，个人主体身份也在自我选择中重新调整、确立。

乌梅出生于农村家庭，成功考入北京的大学，但毕业后却遭遇失业潮，无力偿还助学贷款，因而选择为他人“代孕”挣钱。她这样做，一方面是要克服自身的经济困境，另一方面则与自身要坚守的道德感相关。她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经

济能力、自身价值，以及最为本真的诺言：“我就是为了向父母亲证明，我能够还给亲戚和邻居借给我的钱，这里面有诺言的力量，我们要守信。”<sup>[27]</sup>乌梅抱着要改变命运的“美梦”而上大学，但市场经济下，上大学并不承诺任何个体的前程，其本身也不负责阶层以及经济现状的改变，所以农家子弟一旦毕业后，很有可能会被“打回原形”。荒谬之处在于，乌梅正是因为要避免自己陷入道德困境，才选择“代孕”，而这一方式却使她陷入了新的伦理困境。然而，她始终无法接受完全被客体化、被“使用”的位置，无法强行湮没个人意识。乌梅并非胎儿生理意义上的母亲，与代孕者的契约关系表明她不应该与胎儿产生情感联结。另一方面，母体怀孕后的激素水平变化，又导致她在自然意义上对孩子生出情感。乌梅最终选择传统道德所赞扬的“情”，而非市场经济所推崇的“钱”。她把代孕的钱全部放在中介公司，带着胎儿一起消失了。

韩樱子较之乌梅，其现实处境显然更为糟糕。她家庭贫困，身为家中的姐姐，倘若考上大学，家中也没有能力提供经济支持<sup>[28]</sup>。她高中毕业后到北京打工，历经服装场、歌舞厅等场所，最后因为家里急需用钱，选择做赵亮的“情人”。肖索未通过调查20世纪90年代的婚外包养现象，发现包养行为的深层意蕴并非性需求，反而指向了男性尊严危机<sup>[29]</sup>。赵亮和曾莉都是事业有成的精英阶层，他们的婚姻在社会地位、经济基础方面可谓是“旗鼓相当”。因而，赵亮无法在这段婚姻中占据主导地位，更难以获得传统的男性特权，两人之间亦缺少浓烈的情感。温顺听话的韩樱子与强势精干的曾莉形成鲜明反差，在她身上，赵亮的自我认同感、价值感得以实现，他需要的所谓“尊严”“得到补偿”。

“情人”不仅要承担欢愉的责任，还要成为男人爱情理想的化身，更要时时刻刻怀揣着转变成“好女人”的梦想。韩樱子来北京时本没有对改变生活抱以奢望，但在与赵亮生活的过程中，赵亮不仅为她提供了优渥的生活条件，而且在事业上扶持了她。韩樱子对他心生感激，开始将实现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生儿育女等人生理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是即便是韩樱子怀孕了，赵亮也不会因此给予韩樱子婚姻的承诺。韩樱子



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的权力关系,即自己经济上依附于他,永远无法与他达成平等、可对话的交往状态。她不想再作为赵亮的欲望对象而存在,并试图找回按照自我意志行事的主体感觉。所以,韩樱子最后与赵亮分手时,把房子、车子全部卖掉,把钱还给了赵亮,试图重塑两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这也是韩樱子拒绝市场经济将自身物化的表现。两人分手后,韩樱子依旧多次强调她对赵亮的“情”。她回歌舞厅当领班,不仅是与赵亮赌气,更是她试图以此逃脱被异化成他者的命运、在赵亮面前保持尊严的唯一选择。她意识到,只有专注于事业发展、成就自我才是女性重新获得自尊和自信的有效途径。在生活上自食其力,在金钱上不再依附男性,才能最大化地保存自身主体的完整性,但是她选择的这一途径是否会造成另一种主体的缺失则有待商榷。

吴小英指出,改革开放后的性别话语不再统一,而是呈现出多元裂变的“三圆交叠模式”,即在将“男女平等”定为基本国策的国家话语、强调个人现代竞争力以及消费文化中的性别取向的市场话语和维护“父权制”的传统话语之间形成了一种彼此相交、环环相扣的复杂关系<sup>[30]</sup>。受到多元性别话语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女性身上显现出不同性别话语之间的交叉搏斗现象,这一特质在乡村进城女性身上更为突出。她们所遭遇的生活难题在现实生活中最终形成一种“肉体走进城市,精神恪守传统伦理”的尴尬处境。进城的乡村女性之所以特别,就在于她们经历了城市的欲望诱惑、身体的堕落、个人精神的困惑与痛苦之后,被点燃的个人意识反而带来了传统道德观的回归。她们带着对城市的物质向往而来,最终却无一例外地放弃了金钱,选择了对她们来说更为正当的、更为本真的价值观念,即儒家道德情感框架中的“情”<sup>[31]</sup>。无论是乌梅对乡亲的承诺、对胎儿的母爱,还是韩樱子对母亲的“孝道”、对弟弟的责任以及对赵亮的感情,都是这种性质的“情”。这并不是说作者将其规定为乡村姑娘应有的本质特征,他实则期待这些乡村女性的物欲动机最终能够转化为更为广阔的精神层面的追求,也期待传统道德的某些方面能够在都市中得到某种程度的留存。但在生活难题未解决之前,乡村进城女性是难以承担传承道德遗产的重任的。

作者也意识到了这点,因而对她们的命运怀有悲悯之心。在其笔下,她们的结局模糊不清,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不同于作者笔下的“新美人”表现出来的消费文化视域下的普遍都市景观以及物化的欲望,“北京时间”系列女性形象探寻了独特的都市地方精神,表征了北京的现代化面貌,亦显现出差异化的北京特色。总体来讲,邱华栋笔下20世纪90年代外来进京女性的自决能力、独立意识和自我精神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者通过突出她们自主选择的意志以及行动能力,试图完成女性的自我赋权。邱华栋笔下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本质化的女性主体,他注意到造成女性个体差异的阶层因素及其他身份因素。相比之下,知识女性更容易接受“现代”观念的洗礼,对金钱、情感的追求也更为彻底。在小说中,尽管受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的约束,“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有所回潮,但不同于古代社会的“男尊女卑”,在邱华栋笔下,女性在家庭层面的权力大为提高,甚至显现出某种“性别政治”的置换,表现出北京这一城市面向国际、转型为现代化消费社会的一面。北京改变了“底层”女性的生活方式,同时给她们带来伦理道德的冲击。在历经现代都市生活带来的苦痛和感伤之后,她们依旧执着地恪守着中国传统道德,用“道德遗产”为北京浇筑上一层精神化的“古都”意蕴。

不论是对周瑾在西方如何生活的留白,还是对乌梅等乡村女性命运的开放式结局,邱华栋所展现的20世纪90年代“进京女性”的困境,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的复现,不如说是一种指向新生活的探索,或者说是一种对新伦理的提问。直面20世纪90年代外来进京女性面对的诸多问题,依旧是值得新时代小说发力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1] 陈晓明.现代主义之后的写作:略论邱华栋的城市书写[J].当代作家评论,2021(6):60-66.
- [2] 史建国.速写“城市新人”:邱华栋小说与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J].当代作家评论,2021(6):79-85.
- [3] 陈若谷.1990年代:从城市书写到城市文学:以邱华栋的北京书写为例[J].当代文坛,2023(2):116-122.
- [4] 何平.新生代:文学代际或90年代的文学年轮:作为“新



- 生代”的邱华栋[J].当代作家评论,2021(6):67-78.
- [5] 王志谋.邱华栋小说游荡者形象的精神生态及启示[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2(2):78-82.
- [6] 王辰龙.城史流转与人心迁变:城市发展史视域下的邱华栋小说[J].当代文坛,2023(2):109-115.
- [7] 唐诗人,任旖然.城市生命体的历史与想象:论邱华栋《北京传》[J].东吴学术,2022(6):94-99.
- [8] 杜学文.京与都:时间维度中的空间意义:关于邱华栋的《北京传》[J].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4):91-96.
- [9] 鲁畅.大历史文化观下北京城市历史的非虚构言说:评邱华栋的《北京传》[J].当代作家评论,2021(3):144-149.
- [10] 张翔.跨区域历史叙述的前沿探索:试论邱华栋跨越文史边界的创作[J].小说评论,2023(6):20-26.
- [11] 张梦妮.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学写作:邱华栋创作论[J].南方文坛,2015(6):146-150.
- [12] 荒林.邱华栋:中产阶级和女性的抒情诗人[J].南方文坛,2012(5):110-113,120.
- [13] 梁钺皓.“进城者”与“新都市人”: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两种写作心理:以邱华栋20世纪90年代创作为中心[J].上海文化,2022(2):48-56.
- [14] 魏微.今晚你不留下陪我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48.
- [15] 刘大先.“月亮的朋友”:邱华栋与1990年代[J].当代文坛,2023(2):95-102.
- [16] 王冰.深度现代性:邱华栋写作中的文化坐标:以《正午的供词》为例[J].南方文坛,2022(2):142-144.
- [17] 刘震云.前行者邱华栋[M]//邱华栋.教授的黄昏.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1.
- [18]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简史(1949—2000)[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7:227.
- [19] 宋少鹏.“回家”还是“被回家”? :市场化过程中“妇女回家”讨论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J].妇女研究论丛,2011(4):5-12,26.
- [20] 邱华栋.正午的供词[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 [21] 邱华栋.白昼的喘息[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53.
- [22] 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M].刘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33.
- [23] 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 [24] 王安忆.我爱比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 [25] 杨联芬.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316.
- [26] 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M].吴小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60-271.
- [27] 邱华栋.教授的黄昏[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91.
- [28] 李强,叶显利.你是姐姐:父母男孩偏好与长女家庭收入[J].人口与发展,2023,29(2):138-150.
- [29] 肖索未.欲望与尊严:转型期中国的阶层、性别与亲密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30] 吴小英.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09(2):163-176.
- [31] 李海燕.心灵革命:1900—1950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M].修佳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黄声波